



和中國學生談

和中學生談

馬克思主義

陳學明 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和中学生谈马克思主义

陈学明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义主思克思主学中学

卷 四 学 科

和中学生谈马克思主义

陈学明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5

印数: 1—338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越男 王丽君 封面设计: 吴光前

ISBN 7-5382-1596-4/D·53

定 价: 2.00 元

目 录

- 一、马克思是神还是人 (1)
- 二、世界上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32)
- 三、马克思主义凭什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
面貌 (54)
- 四、马克思主义叫我们怎样活着 (90)
- 五、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115)
- 六、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139)
- 后 记 (155)

一、马克思是神还是人

对于马克思的思想，你可以赞成它、追随它，或者反对它、冷漠它，但无法回避它、摆脱它。只要你愿意研究你所处的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就会感到它随时都在你的眼前。

难道马克思是全智全能的上帝派到人间的先知先觉的神灵？

不，他是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伟大的革命家

站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在回答“什么是幸福”时，言简意赅地写了两个字：“斗争”。这两个字是马克思终生矢志不移的钢铁誓言，也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他顶逆风、战恶浪，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搏斗，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他曾经这样说道：“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5页）

马克思从小就立下了“为人类工作”这一崇高目标。

在中学毕业考试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中，他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马克思在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本来可以到大学去舒舒服服地教书，但他为了拿起笔杆，更直接地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就去办报纸——主编《莱茵报》。马克思以报纸为阵地，为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大声呐喊。例如，当时莱茵省议会通过了一个林木盗窃法，把农民的孩子拣树枝也称作“偷窃林木罪”予以惩治。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深刻地揭露了这个法案的反动性。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为穷人要习惯权利！

由于《莱茵报》具有革命的倾向，1843年1月，普鲁士国王亲自主持的内阁会议决定禁止该报出版。报纸的一些股东们听到政府要查封报纸，就企图改变《莱茵报》的政治倾向来求得报纸的生存。马克思则决不屈服于反动政府的压力，毅然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随即他偕同新婚的妻子燕妮离开了德国，奔赴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巴黎。在这里，他不顾反动警察的跟踪盯梢，一次又一次地到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和工人们亲切交谈，经常参加工人集会，同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深入地研究历史，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研究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

义，一一检验并批判地继承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实现了思想上的伟大飞跃，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845年初，法国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决定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普鲁士反动政府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施加压力，提出把马克思驱逐出比利时。马克思为了不让普鲁士政府再有借口来干涉自己活动，正式声明放弃普鲁士国籍。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那儿就在那儿工作”。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到达布鲁塞尔不久，他和恩格斯一起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通信联络，传播革命思想，使分散在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团体之间加强了联系，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条件。

当时有一个叫“正义者同盟”的秘密革命组织，它的领导人提出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他仍天真地劝说资本家把财产和权力拿出来，平均地分配给大家。马克思对这一组织采取了既批评又帮助的态度：一方面同他们保持通讯联系，同他们的支部进行密切的交往；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积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他终于将这一组织改造成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改成了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新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不但亲自参加了“共产主义同盟”的代表大会，而且还和恩格斯一起，为它起草了一个宣言，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问世不久，欧洲大陆就爆发了一场声势

浩大的革命风暴。马克思奋不顾身地参加了革命。1848年2月下旬，巴黎工人冲进王宫，推翻了国王的反动统治。消息传到布鲁塞尔，群情激昂，工人们用短剑、手枪武装起来，当时住在这里的马克思拿出了数千塔勒（德国银币）赠给工人购买武器用。3月3日深夜，比利时警察闯进马克思家，分别拘留了马克思和燕妮，抄了他们的家，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马克思一家来到巴黎后，在巴黎组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由马克思任主席，组织盟员积极投入这场革命风暴。不久，柏林爆发革命，马克思立即秘密回到了德国，直接领导革命斗争，他派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到各地去，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推翻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迄今人们只谈到两个高级权威……即国会和皇帝，……而忘记了最高的权威是人民！”（《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41页）他还和恩格斯一起，创办了一份大型的革命日报——《新莱茵报》，来宣传他们制定的革命路线和策略。《新莱茵报》的每一篇文章都像榴弹似的打击敌人的要害。它实际上成了当时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反动派以“煽动叛乱罪”多次逮捕审问了马克思。在法庭上，马克思充满激情地说道：“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它。”法官们被马克思驳斥得哑口无言，被迫释放了他。

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委员流亡到伦敦，当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是极端困难的，马克思以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继续领导革命斗争。当德国科隆的反动当局制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以捏造情节、伪造文件等卑鄙手法来陷害

共产党人时，马克思马上挺身而出，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他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搜集审讯的详细情报，分析当时的情况，找出反动派的破绽，并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发表声明，揭露反动当局的卑鄙阴谋。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的圣马丁大厅召开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大厅里挂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各国的工人代表济济一堂，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出席了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协会的领导机构，成了它的“灵魂”。马克思承担了协会繁重的理论宣传和组织联络任务，成立宣言、章程、重要声明和工作报告，绝大多数出自他的手笔。他多次对朋友们风趣地说：我的时间全都被国际的事务占去了，以致从来不能在夜间三点钟以前睡觉。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要两倍于此。

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第一国际积极支持和指导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使当时的工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了国际的行列。第一国际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第一国际的威信越高，各国资产阶级就越害怕。于是他们就在报刊上不断地污蔑和诽谤第一国际，特别是污蔑和诽谤马克思。对于阶级敌人的污蔑和诽谤，马克思总是毫不在意，把这一切当作蛛丝一样轻轻地抹去，只有在万分必要的时候才给予回击。但这时，第一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也猖狂地向马克思发动进攻，他们的破坏活动对第一国际是十分危险的。马克思不得不在第一国际内部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同蒲鲁东主义，特别是巴枯宁主义进行的斗争最为激烈、尖锐，巴枯宁是个要两面

派的阴谋家。马克思曾经说，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巴枯宁到处把自己打扮成第一国际的忠诚战士，暗地里却组织了一个地下“同盟”，阴谋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1869年，第一国际在巴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分子用卑鄙的手法伪造代表证，企图夺取多数票，来迫使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辞职，并把总委员会迁到由他们控制的日内瓦去。第一国际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粉碎了巴枯宁的阴谋。代表大会不仅选出了原来的总委员会，而且通过决议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仍在伦敦。

1871年3月18日的清晨，巴黎被雷鸣般的“公社万岁”的口号声惊醒了。革命红旗在巴黎上空高高飘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马克思立即以实际的顾问和斗争参加者的姿态，自始至终、积极热情地支持和参与了公社的斗争。马克思密切注视着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材料和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他通过一个来往于巴黎和伦敦的德国商人秘密地同巴黎公社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不断向公社领导人提出建议，给以具体的指导。在他的指导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动各国工人支援公社的活动。公社的英雄战士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到伦敦，马克思深感悲痛。在公社被颠覆后的第一天，马克思不顾身患重病，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即《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著作。公社失败后，大批公社战士流亡到了伦敦，他们流浪街头，一贫如洗。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国际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逃亡者救济委员会，援助这些受迫害者，马克思的家则成了流亡者的接待站。他们一家整日为

公社战士的食宿、就业问题而奔波。

紧张的革命活动和贫困的生活条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883年3月14日，初春的伦敦笼罩在茫茫雾海之中，马克思坐在他工作室的安乐椅上溘然长逝，享年65岁。

3月17日，在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公墓为马克思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葬礼。恩格斯在墓前发表了极其动人的简短演说，对马克思的一生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恩格斯在演说快结束时说：

“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崇敬、爱戴和追悼，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6页）

不朽的科学巨匠

马克思不但是在革命疆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而且也是科学圣殿中无与伦比的巨匠。他不畏辛苦，历尽艰辛，攻关夺隘，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创造性研究，获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发现和多方面的科学成就。正是这些伟大的发现和科学成就使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光辉榜样。

对此，只要看一看马克思是怎样写作《资本论》这一“工人阶级的圣经”就一目了然了。

伦敦有个英国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有无数宝贵

的图书。19世纪50年代的有一天早晨，一位读者借了一本书，正想占用一个空位坐下来阅读，值班图书馆员走过来对他说：“先生，这是马克思博士的座位，请你不要占用，他马上就会来的。”那个读者怔了一下问道：“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那位工人的领袖吗？”值班图书馆员答道：“我想大概是的。这里给马克思博士摆着政府所编的工厂工作年报，他现在正在这里研究这些年报。”那个读者又问道：“他每天来吗？你确信，他今天会来吗？”值班图书馆员又答道：“请你放心。几年来，马克思博士每天到这儿都是足足工作十小时。我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我很清楚这里的读者。”那位好奇的读者听了图书馆员的这一席话后，站在那里怀着敬佩的目光，看着马克思的座位上放的那一大堆书，慢慢地走开了。

那时候，马克思正在撰写《资本论》。为了写这部著作，他每天总是非常准时地到英国博物馆图书阅览室去，而且总是坐在他常坐的那个位子上，埋头研究图书资料和官方视察员的一些报表。他又作摘录，又作手记，每天早晨九点钟来，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他数年如一日，几乎天天如此，以至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已经熟悉他这位马克思博士了。他在阅览室读书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天长日久，他座位下的坚硬的水泥地竟被磨光了一层，在那里留下了他的“足迹”。

马克思曾经诙谐地自嘲说，他采用的是1849—1850年英国狗厂主们所实行的换班制度，白天去博物馆，晚上在家写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在那些年代里，他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饥饿、疾病、死亡，常常朝他袭来。有时痼症痛得他无法坐着写字，他就躺着继续写。有时他坐在图书

馆看书，突然两眼发黑，头痛难忍，胸部闷得慌。1867年4月，他对朋友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页）马克思丝毫不为困难所压倒，始终以难以遏止的精力和热情去克服一切障碍，写作自己的巨著。有一次，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头上”，也要完成这部著作。

为了写这部著作，马克思从1843年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收集材料，到1857年整理资料，开始动笔写作。1883年3月他坐在安乐椅上逝世时，他面前堆放的仍是一大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其间，他花了整整四十年的心血。他在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中，读过和摘录过的书就有一千五百多种以上，写的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札记至少有一百多本。凡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学科，例如农艺学、农业化学、实用工艺学、实用经济学、科学技术史，甚至解剖学、复式簿记等等他都细心研究过。为了写第一卷关于工厂法的二十四页文章，他竟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而这些蓝皮书，当时的许多议员们只是把它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他们武器的威力。第二卷中“生产时间”这一章，只有十页篇幅，马克思在写作时却运用了五个国家的炼铁、纺织、制陶、造酒、制革、漂白、造纸、畜牧、植物栽培、饲养种植以及轮作制等详细技术资料。为了写作第三卷中的地租问题，仅他的朋友丹尼尔逊寄给他的有关农业统计资料的报刊就有两立方米多。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恩格斯说得好：自从地球上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出版过一本对于工人如此重要的书；它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在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每当人们打开厚厚的三大卷《资本论》，总对它的严密的结构、透彻的论证和生动的表述惊叹不已。确实，这座宏伟的科学理论大厦是马克思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付出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

了解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过程，就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在总结自己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时所说的下述一段话的含义：“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页）。

科学研究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它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浮夸。作为一个不朽的科学巨匠，马克思一向是一丝不苟地从事科学理论工作的，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者一个数字，都有充分的根据并且得到权威人士的证实。所以，就连反对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找不到一个地方证明马克思有一点疏忽。有一次，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文章说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的英国财政大臣格荣斯顿在议会演说中的一句话是不确实的、凭空捏造的。这句话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地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马克思引用这句话是要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而无产阶级则越来越穷。那个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把这句话说成是马克思凭空捏造的，则是为了否定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替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为了给这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仔细核对了自己过去所作的读书笔记，还到伦敦商业中心西蒂区寻找资料，查对引文。经过仔细的核对和周详的准备，马克思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用铁的事实证明：格荣斯顿在议会演说中确实说过这一句话，只是在半官方出版的议会记录中，格荣斯顿把这一句话删掉了。马克思的反驳文章登出来以后，人们都知道了原来真正撒谎、造谣的不是马克思，而是那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当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纠缠不清时，马克思则声明，由于没有时间同这种“奸商”纠缠，不得不永远停止同这位工厂主的“愉快往来”。但是“告别”的时候，马克思用了一位著名诗人的话来回答这位“博学的”工厂主：“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马克思钻研科学，也热爱科学，他坚信科学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正是这一共同的信念，使他与素不相识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之间留下了一段动人的故事，被后人传为佳话。众所周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11月底出版后，招来了“杀身之祸”，宗教狂和资产阶级辩护士们百般咒骂、围攻达尔文及他所创立的“进化论”。但马克思看到了这本书后极其兴奋，以致好几个月马克思和他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不谈别的问题，而只谈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意义。他在病中通读了达尔文的著作，赞誉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1873年6月16日，为了表达对达尔文的敬慕，马克思把他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赠给了达尔文，还在扉页上题了词。达尔文收到了马克思亲

自题词的赠书后，给马克思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诚愿对政治经济学如此高深而又重大的课题能有较多的了解，以无愧于你的惠赠，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俩人都热诚期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最终造福于人类。”（（转引自《化石》杂志，1978年第1期第10页））。

马克思博大精深。社会科学诸学科不消说，就是对自然科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为了写《资本论》，他研究过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以至解剖学。在晚年时，他还利用空余时间研究数学。他对数学感兴趣，这不但是因为他进行的经济研究要求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且因为他所研究的哲学、辩证逻辑常常涉及到数学。他认为数学是科学的基础。另外，马克思还掌握多种语言。他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他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熟练地运用四国语言。后来，他能够阅读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文字。为了研究俄国的土地问题，他在50岁的时候，还发愤学习俄语。

对于马克思这位不朽的科学巨匠，他的女婿拉法格曾作过这样生动而形象的描述：“他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高尚生活情趣的追求者

马克思致力于从事革命和科学研究，同时，他又极端热爱生活。他长期过着清贫生活，但他决不是清教徒和苦行僧。他尽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更注意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如此的充实和完美，使自己获

得无穷的欢乐和安慰。

旅游是马克思的终生爱好。一旦条件具备，他就远游异乡，满怀喜悦地奔向宏伟壮观的大自然。他一方面通过旅游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利用旅游的机会考察各地风土人情，增长见识。马克思大学毕业了，要从柏林回到特利尔。他决定借此作一次徒步旅行。他身背旅行袋，口哼小调，沿着摩塞尔河畔的蜿蜒小路，向莱茵河的方向漫游。路上，他穿林过镇，山迎水送，饱览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他热烈地拥抱着大自然，大自然也尽装入他宽广的胸怀之中。从1874年至1876年间连续三个夏天，马克思赴卡尔斯巴德边旅游边疗养。在那里，马克思像一个孩子那样，站在泛着泡沫的急流边，倾听淙淙的流水声，是如此的兴致勃勃，心旷神怡。就是在1882年他的健康恶化之时，他的旅游兴致也仍旧不减。他来到了非洲的阿尔及尔，观赏阿尔及尔海湾的美景。他还参观了闻名于世的阿尔及利亚植物园，欣赏美丽的三条纵向的林荫大路：梧桐林荫路、棕榈林荫路和竹子林荫路。

当马克思没有条件远游之时，他就在近处散步，散步成了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早晨，他迎着朝阳迈步在广阔的田野上；晚上，他踏着月光漫游在林荫路上。无论严寒酷暑，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恩格斯迁居伦敦后，马克思几乎每天和他在下午一时左右外出散步，一起攀登汉普斯泰特荒阜一带山丘。他们并肩而行，信步漫游，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烟酒是人生的一大乐趣，马克思也不例外，他嗜烟好酒。1882年6月，马克思在巴黎治病期间，天空经常被乌云遮盖着，不时下雨、刮风，与其说像夏天，不如说像深秋。此情此景，引起他对吸烟的美好回忆：“按我过去的状况，